



论鲁白野《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的  
身份认同与叙事策略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e Malayan Sketches and its sequel by Lu Bai Ye**

廖萱茵

**LIUA SUET YAN**

**17ALB0597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0**

# 目次

宣誓.....	v
摘要.....	v
致谢.....	vi
第一章·绪言 .....	7
第一节·研究对象.....	7
第二节·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8
第三节·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结果.....	9
第四节·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10
第五节·研究资料.....	11
第二章·外在的华侨身份 .....	12
第一节·离散意识的形成 .....	12
第二节·维系中华文化认同.....	13
第三节·文化认同与叙事策略.....	14
(一)“华族的马来亚”建构 .....	14
第三章·内在的本土属性 .....	19
第一节·鲁白野的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 .....	19
(一)本土记忆.....	19
(二)本土位置.....	20
(三)本土自觉.....	21
(四)本土关怀.....	23
结语.....	24
参考资料 .....	25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所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

姓名：廖萱茵

学号：17ALB05971

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

论文名称：论鲁白野《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策略

论析学生姓名：廖萱茵

指导教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是组成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在鲁白野后来的作品如 1958 年出版的《马来亚》一书中，其身份认同已从族群认同转变为国族认同，而这身份转变的因素包含了中华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的参与及形塑。由此，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鲁白野外在的华侨身份即离散意识的形成以及他与中华文化的维系如何在文本中为华族塑造历史主体；而内在的本土性方面则旨在挖掘它的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并研究他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

关键词：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 离散意识 本土意识

## 致谢

三年大学生涯转瞬即逝，恍惚间就到呈交毕业论文的时候了。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对我的宽容与信任，对于毕业论文选题初期，给予我足够的自由与信任，让我可以自行选择感兴趣的研究题目。在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也对我非常宽容，并没有在时间上给我太大的压力。另外也要感谢我的顾问老师李树枝老师在论文资料方面的协助，以及在我询问期间给予我的耐心。

再者，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在论文写作期间对我的鼓励与支持，让我产生更多的写作动力。这里特别想感谢章哲对我的包容、体贴与关怀。在我论文写作期间，我所有的崩溃、不自信以及自我怀疑都在你那里得到了舒缓。谢谢你对我的肯定，让我暂且找回一点自信。还有论文写作期间，你也承包了我的饮食起居，让我可以安心写作。对你的感激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

最后，感谢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们，因为您们，我才能在求学期间收获丰富的知识，感激不尽！

## 第一章·绪言

二战结束后,鲁白野结束在印尼 12 年漂泊流浪的生活,选择重返马来亚。彼时的马来亚华文文坛正处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主张时期,其所主张的内容主要是呼吁作家在作品创作中注入更多“此时此地”的真实情感以及以本地人的视角来进行书写<sup>1</sup>,这种创作主张也意味着本土意识的提升与强化。

短短 7 年的时间,鲁白野就发表了 10 本著作,当中包括论文所研究的对象《马来散记》。作为一本地方本土文史散记,《马来散记》表现了鲁白野对于身份认同的探索与形塑过程,而这其中因漂泊流浪期间所产生离散意识、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是探索鲁白野身份认同所不可忽视的因素。马来亚在 1957 年独立后,鲁白野的身份认同从“侨民”转向“国民”时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适感,反而将早前在《马来散记》中所指的“我国”,迅速从“中国”认同转向“马来亚”认同,故研究《马来散记》的身份认同除了能够更了解其中的转变因素,也能窥探出独立前华人作家的身份认同。

由此,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鲁白野外在的华侨身份即离散意识的形成以及他与中华文化的维系;而在内在的本土性方面则旨在挖掘它的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并研究他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

### 第一节·研究对象

鲁白野(1923-1961)原名李学敏,其他笔名还有威北华、楼文牧、越子耕、华希定、范涛、破冰、姚远、郁强等。1923 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怡保,在怡保育才学校求学,于五年级时辍学,自此之后便开启了他漂泊流浪的生活。他离校后曾到过马来半岛各地如拿乞、万里望、金宝、红毛丹、马六甲、檳城、以及新加坡。1942 年日据时期,他与父亲逃亡到印尼。在这期间他为了躲避日军的侵害而四处逃亡,曾当过农夫、文化工作者、抗日分子、囚犯、失业者、士兵、报馆编辑、教员等。二战后,他参加了印尼的独立战争并在两年后退役。

---

<sup>1</sup>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页 235。

其后他加入了文艺社团“蚁社”，认识了“四五世代”作家，并因此与印尼诗人安华（Chairil Anwar）结交为好友，鲁白野的文学多元书写便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1948年，鲁白野结束了长达6年的印尼流浪生活，选择到新加坡定居。在新加坡期间，他因通晓多种语言，前后任职法庭记者兼通译等。自1950年代起，他便在《星洲日报》担任国际版电讯翻译，创立与主编《星洲日报》马来文副刊“国语周刊”。1953至1960年间，他先后出版了散文、小说、游记与诗歌等作品，而本文所讨论的《马来散记》<sup>2</sup>与《马来散记·续集》<sup>3</sup>即是他于1953年所出版的文史散文集。1961年4月26日，他因高血压和心脏病骤发伏倒在《星洲日报》报馆的办公桌上，最终于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结束了他38年短暂又不平凡的一生。

## 第二节·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笔者之所以选择鲁白野《马来散记》作为研究方向，主要是被其充满个人特色的文史书写所吸引。随着作者对史料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贴切的在文史书写中置入个人情感与生活体验以及其在描述人事物时所使用的诗意文字技巧让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犹如走进了鲁白野所描述的历史事迹，对其所写的本土文化更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故此，笔者决定研究鲁白野《马来散记》的身份认同以深入探析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如何影响其多元文化的写作模式。

王润华教授形容鲁白野为“天才早逝诗人”<sup>4</sup>，即便如此他却似乎逐渐被文坛所遗忘。鲁白野的文学作品既多元又具时代色彩，本应有高度研究意义。但是文学史上一向多以单一视角如年代、历史事件、文学流派等等来评论文学，鲁白野作品因多元与复杂性使得当代学界无法用相同的视角将他定位，他也因此不受马华文学界的青睐。这绝对是马华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

<sup>2</sup> 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10月初版。

<sup>3</sup> 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10月初版。

<sup>4</sup>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6

《马来散记》有别于一般的历史书写，作者在史料上做了大量的考证，在论述某个历史事件时往往能引相关资料作为辅助。除此之外，他还会在论述历史与文化的当儿加入个人情感及所见所闻，如此的文史书写方式使其散记变得更为生动迷人，更容易引导读者进入他所书写的历史情境中。他的文笔流畅，善于用意象与诗意的文字来描写事物，让其文史书写兼具美学价值。

作者在书中大量书写马来亚华人的贡献，填补了华人在马来亚历史上的空缺。与此同时也不忽略对马来族与印度族的文化与历史记载，以及殖民者建设马来亚的贡献。鲁白野的《马来散记》于当时而言可谓是拥有面面俱到的历史观。研究《马来散记》也可从中窥见华人的本土认同历程。

因此籍着对鲁白野《马来散记》的文史书写研究，笔者将研究他的身份认同对于他在文学写作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意义。

### 第三节·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结果

随着学者对鲁白野及其作品的重新审视，鲁白野近年来已逐渐引起关注及研究。不过对于《马来散记》的研究仍是少数，至今尚未有一本书籍是专门讨论鲁白野的文史散文研究。故此，笔者梳理了部分与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总结。

书籍方面，有周星衢基金出版的《马来散记·新编注本》<sup>5</sup>，其为鲁白野的《马来散记》添加了多达15万字的注释及丰富的导读，王润华更盛赞其为“历史上最早挖掘、最深的考古式文化书写之一”<sup>6</sup>。内有王润华为之所做的总序〈重读鲁白野〉<sup>7</sup>提出了鲁白野多元书写的特色与来源、研究了流亡印尼的生活为鲁白野写作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当今马华文学界对鲁白野的忽视作出批判。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六篇导读文章即叶欢玲〈面面俱到的马来亚史〉<sup>8</sup>与〈趣味

---

<sup>5</sup>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

<sup>6</sup>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

<sup>7</sup>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6-21。

<sup>8</sup> 叶欢玲〈面面俱到的马来亚史〉，《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33-41。

盎然的地方志》<sup>9</sup>、仇莉莲〈各负雄才留青史〉<sup>10</sup>与〈文化撞击的激动〉<sup>11</sup>、郭诗玲〈垦出一派风光〉<sup>12</sup>及〈无数的“我不知道”〉<sup>13</sup>。这6篇文章分别为《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史话、方志、人物、文艺、风物和掌故的篇章做导读，让读者能够更了解鲁白野的写作风格与特色。

在论文方面，有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sup>14</sup>是针对《马来散记》中使用的华人视角作出评析。

#### 第四节·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身份认同理论来分析鲁白野《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本土性。此外，本文也会使用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中“早期记忆”来分析鲁白野在文学中所书写的“记忆”背后的含义。

论文第二章集中讨论鲁白野如何在《马来散记》中表现“外在的华侨身份”。该章底下划分为三小节分别探析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与中华文化的维系以及他的文化认同与叙事策略。论文的第三章则是论述鲁白野内在的本土性，此处将从一个小节来讨论其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

---

<sup>9</sup> 叶欢玲〈趣味盎然的地方志〉，《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121-126。

<sup>10</sup> 仇莉莲〈各负雄才留青史〉，《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183-186。

<sup>11</sup> 仇莉莲〈文化撞击的激动〉，《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313-315

<sup>12</sup> 郭诗玲〈垦出一派风光〉，《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231-235。

<sup>13</sup> 郭诗玲〈无数的“我不知道”〉，《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273-277。

<sup>14</sup>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第29期，2016年6月。

## 第五节·研究资料

本论文以 1954 年新加坡世界书局所出版的初版《马来散记》与《马来散记·续集》为主要研究资料。辅助资料方面有：周星衢基金 2019 年出版的《马来散记·新编注本》，以便对鲁白野在文中所引之典故、部分历史的人事物、特有名词与异体字等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张松建所著《新马文学六论》中〈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有助于本论文更进一步探讨鲁白野的文化认同与离散意识。理论相关的书籍有：张锦忠著《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许文荣著《马华文学类型研究》、朱立立著《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都有助于在理解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离散意识、本土意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方法。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作者的书写特色，本文也会参考及研究鲁白野其他著作的写作特色如《春耕》<sup>15</sup>、《黎明前的行脚》<sup>16</sup>来分析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

---

<sup>15</sup> 鲁白野《春耕》，新加坡：友联图书公司，1955。

<sup>16</sup> 鲁白野《黎明前的行脚》，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

## 第二章·外在的华侨身份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是采用“华侨视角”来展开论述，除了梳理出马中两国悠久源长的交流史，也书写了许多对马来亚发展有着巨大贡献的华侨及其事迹。从表面观之，《马来散记》的叙事策略无疑充满了浓厚的中国性意味，而这实际上是结合了鲁白野漂泊流浪期间所产生的离散意识与文化认同的表现。本章将会探讨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以及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与认同，如何影响其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叙事视角与策略。

### 第一节·离散意识的形成

若要研究鲁白野的文化认同，首先得讨论其离散意识的形成。在马华文学中对于“离散”一词的定义，是指一个族群因客观形势或自我选择而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的“漂泊离散”的历程<sup>17</sup>。鲁白野的离散经历可以追溯到他五年级从怡保育才学校辍学开始，在那之后他就开启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流浪生活：到过拿乞、万里望、金宝、红毛丹、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印尼，最后回归马来亚并在新加坡定居<sup>18</sup>。侨居印尼的十二年间，他为躲避日军侵害而四处逃亡，曾当过农夫、文化工作者、抗日分子、囚犯、失业者、士兵、报馆编辑、教员等，漂泊离散的经历已然构成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远离故土后，在他国面对被边缘化而产生的经验与感受<sup>19</sup>正是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在印尼流亡期间，他亲身感受到作为弱势族群的离散华人在历史进程中如何遭遇苦难与伤痛。因此，他在《流星》中塑造了不少关于离散华人的故事，如〈南燕北雁〉中被迫成为汉奸，错过所爱之人的印尼华侨“子青”；〈一人的山〉中因不谙华文与中华文化而遭嘲讽的“天风”，主动与中国文化断绝关系，投入印尼民族解放战争，最后惨遭荷军击毙；〈今天还不是春天〉的华侨

---

<sup>17</sup>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马华离散文学与政治无意识〉，（台北：里仁书局，2014）页 134。

<sup>18</sup> 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页 1-2。

<sup>19</sup> 许文荣，〈马华离散文学与政治无意识〉，页 144。

“海伦”为了参加印尼抗日救亡与马来亚抗日地下组织而放弃爱情；〈括风底春〉写“我”作为流亡华人，如何影响不问世事的青年画家“华查”逐渐关心国家时势。

另外，合集〈黎明前的行脚〉有两篇文章与印尼华侨处境有关，即：〈负伤兵〉中描述了印尼华侨如何惨遭利用、掠夺与杀害，以及〈战俘〉中作者同情并对与荷兰殖民军队抗战的印尼人民施以援助；同时又痛恨于印尼杂牌军与败兵残暴屠杀华侨一事。

离散华人的故事塑造透露了鲁白野对于离散华人的处境与遭遇之焦虑。由此，一个被边缘、被放逐的离散华人作家，于是主动拥抱文化祖国（中国），为自我身份认同与离散的族群命运找一个强大的后盾与信仰。

## 第二节·维系中华文化认同

著名马华文学评论家张锦忠说：“一个新马华人，如果因现实的阻隔，无法亲中倾共，并不表示他的政治认同就会自动转变或以本土文化为归属<sup>20</sup>”。1949年中共掌权后，殖民地政府为了阻止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在马来亚土地上传播，故禁止两地人民自由来往，同时也禁止中国书刊输入本土。然而鲁白野并没有因此隐藏或更换认同对象，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彼时马来亚未从英殖民政府手中取得独立，鲁白野在印尼漂泊流浪了12年，带着离散华人的意识重返马来亚，漂泊无根的焦虑感急需政治上的寄托，由此其对中华文化认同并没有因此而削弱。

关于鲁白野的文化认同，最早要从他峇峇的身份开始论述。对于南来华侨作家武断地将峇峇文学归类为马来文学，鲁白野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写道：“峇峇文学固然是用马来文表达，但其本质还是表扬着纯粹的中国思想。因此，它应该是属于华侨文学的支流<sup>21</sup>。”从这段论述可以得知，鲁白野认

<sup>20</sup>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页109。

<sup>21</sup> 鲁白野，《马来散记》，页54。

为峇峇的文学蕴含纯粹的中国思想，侧面反映出其峇峇娘惹的家庭环境应该是受到中国思想与文化熏染，从而塑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其次，是关于教育方面。鲁白野虽在五年级便辍学，然其小学（怡保育才学校）教育内容主要以中华文化为主，这也是鲁白野面向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马来亚此处漂泊与流亡印尼的日子里，鲁白野的生活虽波折重重，但他却坚持阅读华文文艺书籍，并以华文书写来从中获得方向感，维系离散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sup>22</sup>。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曾提及老舍自述〈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也讨论了艾青和中国的街头诗<sup>23</sup>。由于在流亡印尼期间，他深刻体会到作为离散华人失根后的焦虑与痛苦经历，因此他在书写关于荷兰殖民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及印尼军士方面都带有深刻的批判意识<sup>24</sup>，并加深了自我文化认同的倾向。

### 第三节·文化认同与叙事策略

#### （一）“华族的马来亚”建构

鲁白野结束了十二年的印尼流浪生活后，选择重返马来亚。伴随着漂泊流浪期间产生的离散意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鲁白野自 1949 年开始便在马来亚大量写作，并于 1950 年代发表许多著作，其中《马来散记》及《马来散记续集》的发表时间仅相隔一年。

对于书写《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目的，鲁白野在序文及〈谈马来亚的历史〉篇中这样写道：

---

<sup>22</sup>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 140。

<sup>23</sup> 转引自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页 140。

<sup>24</sup>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页 140。

“我要把故乡长成的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要亲切地写我们的先人曾经怎样流了无尽的血汗在努力开拓它、耕耘它，创造一个幸福、繁荣的新天地<sup>25</sup>。”

“中国与马来亚的古代关系既是那么密切，现代的马来亚又是我们祖宗辛苦经营，从荒地开垦成为一块富饶的土地。我们更应在历史创作上努力，把马来亚历史的丰富资料重新搜集和整理，我们要写成一部更客观的、正确的、没有偏见的马来亚史<sup>26</sup>。”

除了表现出对故乡的爱慕与憧憬，更多的是鲁白野已意识到华族在马来亚的历史位置与贡献被有意遗忘及边缘化。由此，为了凸显华人对马来亚历史发展的贡献，鲁白野从马来亚与中国的文化互动方面下手，以“华侨视角”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展开叙事。

他首先将华侨南来马来亚开拓的历史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湮远时代到明朝期间，中国人与马来本土居民进行和平贸易；第二阶段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扶助满喇加王朝建国；第三阶段则是十九世纪后，华侨劳工的大量输入以及其为马来亚种植业与矿业的巨大贡献<sup>27</sup>。划分好上述阶段后，鲁白野便开始围绕在这三个阶段所出现的人、事、物来展开论述。

从《马来散记》中可发现：马来亚地方的开拓者有开发柔佛的大功臣陈旭年、努力开拓霹雳太平的中国人民及吉隆坡的开拓发展者叶亚来；马来亚行业发展有开辟橡胶业的始祖陈齐贤以及开辟甘密业与胡椒业的潮侨；交通方面有最先组织船业的土生华人陈明水等人、首个造船成功的华侨何亚忠以及成功模仿两轮脚车的华侨；港主制度的由来与甲必丹制度的兴衰等等，介绍完 26 篇与华人有关的历史及制度后，鲁白野才开始介绍其他族群，但其在叙事中仍不断点出华侨的影子，强调马来亚与中国的交流史。

除此之外，鲁白野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叙事中以中国人自居，如：〈谈马来亚的历史〉、〈马来民族的拓殖〉、〈回教今昔〉、〈拿律之役〉和〈谈马华字

---

<sup>25</sup> 鲁白野，《马来散记》，〈序〉，页 2。

<sup>26</sup>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2。

<sup>27</sup> 鲁白野，《马来散记》，〈序〉，页 2。

典的编辑>中所提到的“祖国”、“我国”及“国人”即指向遥远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表现出离散华人彼时的身份与文化认同。

对于马来亚的现代史，鲁白野是这样定义的：“一部马来亚现代史就等于一部马来亚华侨史<sup>28</sup>”。为此，学者张松建认为这是作者贯穿在文本内“华族中心主义”的写作意图<sup>29</sup>，其目的旨在赋予华族高尚伟大的形象。故循着这般思路，鲁白野将华人塑造为马来亚现代史主体，其他种族就不免沦为了“附属品”了。鲁白野在介绍其他族群的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不仅将其与中华文化并谈，还透露出比较的意味，故导致华族的色彩过于鲜明而遮蔽了其他族群的特色，也使相关内容的叙述稍显牵强。具体例子如下：

介绍<马来民族的拓殖>：

“历史已经证实了马来亚民族不但具有强大的拓殖力，而且生活力也强，所以会有今之广阔空间。这种惊人的民族毅力，恐怕是仅次于中华民族的毅力了<sup>30</sup>。”

介绍<回教东侵>：

“要是比较起来，马来亚及印尼的回教历史，还没有中国的回教史那么悠久呢<sup>31</sup>！”

介绍<马来古炮>：

“中华民族有着一个酷爱和平的优秀传统，始终没有想要把火药发展成为恐怖的杀人武器<sup>32</sup>...”

由此可知，鲁白野所言“客观”、“正确”及“没有偏见”的历史叙事，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然历史有其局限，当代人的思想与眼界也被所处的时代所限制。针对鲁白野的“华侨视角”叙述，笔者认为鲁白野《马来散记》并不至于沦为“华族优越感”的代言，反之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离散华人作家

---

<sup>28</sup>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3。

<sup>29</sup>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页 140。

<sup>30</sup> 鲁白野，<马来民族的拓殖>，页 145。

<sup>31</sup> 鲁白野，<回教东侵>，页 204。

<sup>32</sup> 鲁白野，<马来古炮>，页 234。

致力于填补华侨在马来亚历史上的空缺，以助华族在马来亚历史中得以重新定位。

身处政经文化迅速转型的激进时代，文化失根的焦虑使鲁白野有感于“中国文化在马来亚只能作轻淡的影响，很快就被历史的时光磨灭了<sup>33</sup>”。除了忧虑于中国文化即将在这片土地消失，鲁白野也批评当地华侨漠视中国人在海外的成就：“国人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可谓是能够澈底了解的，但是，对太平义士在海外的成就，可说却是完全忽略及不重视的了<sup>34</sup>”。鲁白野籍着书写来呼吁华侨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华族历史的位置，由此可知鲁白野书写《马来散记》的迫切意义。

## （二）为峇峇文化认同平反

华人男子与马来女子通婚，其后代被称为“峇峇”（Baba，男性称呼），“娘惹”（Nyonya，女性称呼），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定居于马六甲、新加坡与檳城，又称“海峡华人”或“土生华人”。著名的峇峇如：伍连德、辜鸿铭、林文庆、陈祯禄等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然而在新马华文文学中，峇峇娘惹却长期承载着负面的形象与移民华人的曲解。丘士珍所著的《峇峇与娘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文本中描述同父异母的峇峇与娘惹之间的乱伦恋情，崇洋媚外的性格以及最终酿成弑父的悲剧。

在《峇峇的文学》中，鲁白野认为峇峇文学固然用马来文写作，但其本质还是纯粹的中国思想，应该属于“华侨文学”的支流<sup>35</sup>。他尝试将峇峇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文化特征点出来，比如：尚保留中国姓名的峇峇后代、搜集各地的华侨史料并集结成书与热爱中华文化的峇峇对于翻译中国各类型文学的努力。针对峇峇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鲁白野给予了肯定与赞赏，并指出：

---

<sup>33</sup> 鲁白野，〈印度文化的影响〉，页 184。

<sup>34</sup> 鲁白野，〈拿律之役〉，页 50。

<sup>35</sup> 鲁白野，〈峇峇的文学〉，页 54。

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就是过去建设峇峇文学的努力完全是自发的、自觉的，不是由中国出生的华侨所策动的。口口声声骂峇峇不爱祖国文物的人们，知道了这些史实，对峇峇的观念应该有所改变吧。这些努力一方面促使峇峇与中国更加接近，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与印尼（及马来亚）的文化交流<sup>36</sup>。

鲁白野在这里为长期以来带着“原罪”的峇峇社会平反，赞美他们的自觉性与自发性对于促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峇峇社会走了一个大圈子，已有回到纯中国文化怀抱的趋势。受中文教育的侨生已在 大大增加，这使星洲峇峇的人数在锐减，只有麻六甲和檳城的峇峇社会还保有坚韧 的生命。像过去林文庆先生亲身到马来亚及爪哇各地大力推行国语教育运动，及今之陈祯禄先生在大声疾呼中国文化在马来亚必须受到保护，都是代表峇峇文化运动归队的主流<sup>37</sup>。

最后鲁白野还强调已有越来越多的峇峇回归中华文化的怀抱，并以其他峇峇代表人物的主张来证明峇峇的文化认同。显然，鲁白野在探讨峇峇社会的课题上可以给出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考察与评价。这点似乎隐喻了他本身对于其他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他在身份认同上的多变性。

---

<sup>36</sup> 鲁白野，〈峇峇的文学〉，页 58。

<sup>37</sup> 鲁白野，〈峇峇的文学〉，页 58。

## 第三章·内在的本土属性

二战后，英殖民政府为了镇压马共成员，故意边缘一切与华人传统文化有关的事物。鲁白野的强烈的文化认同使他在叙述中不断强调中华文化对马来亚渗透的重要性以及凭一己之力在文学论述中重构马来亚历史的主体。但从《马来散记》的内容安排与叙事策略上可以发现，鲁白野的本土性并不亚于中国性的文化认同。本土属性在鲁白野的叙事中是一种比较低调的、不喧宾夺主的方式来助其寻找身份认同。本章主要挖掘鲁白野在叙事中表现出来本土性，并加以分类及分析。

### 第一节·鲁白野的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

#### （一）本土记忆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序中如此写道：“我是诞生在吡叻河的岸上的。霹雳河在它自己的记忆中，是一个时常掀起了满江波浪在发怒的巨人。在雨季中，人们就会害怕霹雳河的突然愤怒，滚起了混着浓黄泥浆的高潮在大力泛滥<sup>38</sup>。”吡叻河的记忆便是鲁白野赋予它的记忆，而其中便融合了土生华人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体会。

接着鲁白野在《谈马来亚的历史》中将“记忆”与“历史”并谈，点出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也给了他对于身份认知的思考：

正如个人会有记忆，人类社会有的是历史。记忆能够说明我们克服个人的错误和弱点。同样地，历史记录人类社会过去生活的实践和活动，优秀的传统和正义的感想。这就能帮助社会的迅速进步，消除愚昧的落后意识，避免重犯旧的历史的错误。<sup>39</sup>

---

<sup>38</sup> 鲁白野，〈序〉，页 1-2。

<sup>39</sup>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2。

阿德勒于《自卑与超越》中分析道：“个人的记忆是心灵现象内最能显示当中秘密的。记忆被本人随身携带，这过程可以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境意义的载体。记忆从来不是偶然而至，个人从他接受过繁多的印象中所挑出来的记忆，就是他认为对他的处境有重要的因素或影响<sup>40</sup>。”

在〈古城两题〉的叙述中，鲁白野认为华人对“荷兰人建筑的市政厅的红墙已退色”以及“圣保罗山上曾经埋葬过圣芳济的空穴”可以不感兴趣，但是“古城是不能抛弃它的记忆的”，而这“记忆”反映的就是昔日华人在这片土地遗留的痕迹：

在有着两百多年的生命的庙宇顶上，还有金龙在伸张着锐利的爪在飞呢。古城是峇峇社会的诞生地。不少人会告诉你，他们在这里住了四代了。站在马六甲的大桥上，我在回忆此处曾发生过的数世纪前的斗争<sup>41</sup>。

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生命的庙宇顶”的青云亭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寺庙，它承载了南来华人的历史记忆；也见证了后来土生华人的命运。峇峇娘惹象征中国与马来本土的文化结合；数世纪的斗争则是马六甲苏丹王朝内部争斗，连接着后来葡萄牙的侵占。鲁白野透过早期记忆来带出华人南来落地生根、参与本土建设的见证，但随着外来因素的威胁而导致了华人漂泊离散的命运。

然而，鲁白野并没有因此通过逃避来寻求民族的优越感。他清楚地意识到过度沉湎于记忆的问题，因此他从记忆中抽离回到现实，并鼓励马六甲人振作起来，共同创造未来的好日子，使马六甲成为东南亚繁荣的商业中心。从鲁白野的叙事中体现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归属感，还有扎根马来本土的自觉意识。

## （二）本土位置

在〈谈马来亚的历史〉，鲁白野透过历史记忆将马来亚的地理位置定位为东方两国交流的关键通道，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却引出了他对于本土位置的认同。

---

<sup>40</sup> 转引自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页 137。

<sup>41</sup> 鲁白野，〈古城两题〉，页 12。

马来亚的历史是蕴含着丰富的资料的，且在世界的史底发展中是一个异常重大的关键。哥伦布为了要找寻东南亚的乐园才向西方航行。他结果找到了美洲，但在他临终时还以为新大陆是马来半岛呢！在二千年前，从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航行到中国大陆的商船，都是尽可能沿途泊岸做买卖及装取食水的。我们如果展开了东南亚地图，便能看得很清楚，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海道。通过它，中国才能与中东国家接近。通过它，我们才能见到世界一家的理想的雏形<sup>42</sup>。

在谈〈旧柔佛之历史价值〉中，鲁白野再次强调了马来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大秦（古罗马）烧珠的发现，以及也战前（疑指二战）在北马玻璃市发现的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陶器碎片及烧珠，都证实了马来半岛在二十世纪前便是东西交通与互市的一个中心点<sup>43</sup>。

虽然在鲁白野在上述书写中隐隐表达了“马来亚地理位置的优越有助于中国对外交流”的意味，但通过不断强调马来亚（本土）位置的重要性也带给了鲁白野自身一种身份认同的意识。

### （三）本土自觉

根据鲁白野在〈谈马华字典的编辑〉提供的人口数据显示：

马来亚人口总数已超过五百万，其中二百六十三万是马来人，二百多万是华侨。在星洲，总人口也突破了百万大关，其中八十巴仙是华侨，单单在这数字上看来，我们便能够了解华侨在星马两地所占的异常重要的地位了<sup>44</sup>。

鲁白野对于马来亚的马来人口与华人人口人数近乎相等的事实，鲁白野却没有表现出大一统的意识，（朱崇科理论）而是积极建设华马两族交流的桥梁。

---

<sup>42</sup>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2。

<sup>43</sup> 鲁白野，〈旧柔佛之历史价值〉，页 29。

<sup>44</sup> 鲁白野，〈谈马华字典的编辑〉，页 191。

鲁白野发现了马来亚大多数华侨的问题，即没有像印尼华侨般融入当地文化，学习马来语，用来与马来族进行更深更广的交流，反而因存有终究要回归祖国或大中华主义的想法而固步自封，不愿学习他族语言。因此他努力想透过书写来呼吁马来亚华侨应该了解语言交流在多元民族地区的重要性：

在过去，一谈起研究马来亚问题，便有人在翘首北望，希望遥远的中国单独负起这个历史的担子，这是错误的。这种工作，与我们自身利害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偏要让别人去负责？

文中所言“利害”即指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中马友好关系。由此可见，鲁白野具有“建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想法。然而鲁白野的自发性不仅表现在他编辑《实用马华英大辞典》的努力，而他在〈谈马华字典的编辑〉时已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本土意识：

固然，学术不应有南北之分，可是由住在此地的人研究此地情形，不是更切实、更适宜么？让一个远隔重洋的人来研究南洋事情，到底还是会有点隔膜的<sup>45</sup>。

鲁白野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作家所谓的“在地经验”。作为“他者”的作家在本土书写上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具有“在地经验”的作家才能更好地诠释当地文化与特色。

此外，鲁白野透过数据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洞察来凸显回教课题的重要性。他首先引出阿拉伯与中国两地的商业互动与传教的历史来强化华族对回教课题的重视。接着他把文本时空转向马来亚最古的回教遗迹，分析回教如何传入马六甲王朝，再进行一次时空的转化，五十年后的马来亚已被誉为“东南亚小麦加”。鲁白野将回教东侵的历史在文本中进行了如上的叙事铺排，让文本的时空变化来塑造马来亚独特的地方色彩。

#### 〈回教东侵〉

住在回教地方，对回教事情，实有研究及了解之必要。马来西亚是回教地方，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邻近的已经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虽然没有

---

<sup>45</sup> 鲁白野，〈谈马华字典的编辑〉，页 192。

明文规定回教为国教，但是他的人民有八十五巴仙是信仰回教的，因此，住在马来亚及印尼所构成的区域的我们，瞭解回教事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了<sup>46</sup>。

#### （四）本土关怀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中对于地方的经济与本土时事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这也是一种“立足本土”的表现。比如他在谈〈丁加奴——河流的国度〉时，就反映出彼时的丁州是经济生产最落后的国家，不但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铁路。接下来，他进一步指出丁州的其他落后现象：“今日的丁州，是什么都缺乏的地方，尤其是医院、学校、书籍的缺少，是最严重的现象<sup>47</sup>”。接着他进行自我以及族群对于本土的确认和反省：

为什么华侨会突然放弃了历史更悠久的东海岸，而宁愿集中在西岸建筑起新的天地呢？这应该是马来亚历史中一个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以为<sup>48</sup>。

---

<sup>46</sup> 鲁白野，〈回教东侵〉，页 204。

<sup>47</sup> 鲁白野，〈丁加奴——河流的国度〉，页 192。

<sup>48</sup> 鲁白野，〈丁加奴——河流的国度〉，页 192。

## 结语

对于鲁白野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让笔者从中观察到他存在身份重构的痕迹。在一个政经文教迅速转变的时代，本土华人已经衍生出多重的身份认同。然而鲁白野在《马来散记》的内容构造以及表达都表现了很明显的“族群认同”倾向，而这种倾向正式源自于他身为离散华人的文化认同。在印尼漂泊流浪的日子让鲁白野产生了离散意识，却也正因如此而构成了他的多元文化视野与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在文本中表现了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但他的本土意识也在不断萌芽，王润华甚至说：“他的马来本土属性比任何当时的华文作家都强烈<sup>49</sup>”。由此可见，鲁白野当时的文化认同倾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既怀有浓烈的中华文化认同，同时也具有本土意识，如此一来，读者便可从中阅读到他精彩的多元论述，与他一同感知彼时的马来亚风气。

总结而言，鲁白野《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文史书写不管是从意识、视角、遣词用字亦或个人经验与感受都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笔者认为本论文尚可拓展的相关课题如：对鲁白野《马来散记》的内容选取与编排研究。笔者认为鲁白野在其作品架构、内容选取及排序上皆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故尚可做更深一层的研究。

文末，笔者期望透过此论文，能够激发学界对鲁白野的创作进行更深一层的挖掘与研究。因其多元、复杂与极富个人特色的书写正是马华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星，虽然他已从文学的天宇陨落，愿学界能让其文学重放光芒。

---

<sup>49</sup>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页 6。

## 参考资料

### 专书

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

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

鲁白野《春耕》，新加坡：友联图书公司，1955。

鲁白野《黎明前的行脚》，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马华离散文学与政治无意识〉，台北：里仁书局，2014。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